

试论中国古代佛教寺额命名的主体、缘起及其特点 ——以浙江省为例

石洪斌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旅游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53)

【摘要】本文以浙江省为例,对中国古代佛教寺额命名的主体、缘起进行研究,分析了寺额命名的特点,揭示了佛教繁荣与政权的正相关关系以及佛教传播的策略、佛教义学思想发展的轨迹、佛教信仰重心的演变,指出佛教寺额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佛教不断自我调适,融入中国本土化的过程,是佛教在中国两千年发展兴衰的缩影和风向标。

【关键词】中国佛教;寺额命名;缘起;特点;浙江

【中图分类号】B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267(2013)02—0123—03

寺院是中国佛教标志性的建筑,是佛教存在的支撑点,是民众认识佛教和走进佛教的最直接媒介。凡寺院都有名称,叫做“寺额”。孔子言:“名不正则言不顺。”中国自古重视正名,每个寺额的命名缘起或许是偶然的,但从历史的发展看,则有特点可寻。浙江自古佛教昌盛,“钱塘素多巨刹”,五代吴越国以降更是号称“东南佛国”。故本文以浙江省古代佛教寺院为例,从分析寺额的命名主体、命名缘由入手,试图揭示两千年来佛教寺额命名的特点。

一、寺额命名的主体

1. 寺院僧人自己命名。一是寺院创建命名,命名主体多是开山祖师,如杭州灵隐寺、宁波天童寺,是寺院命名最普遍的方式。二是寺院因重建而改名。

2. 帝王敕赐寺额。包括三种:一是皇家敕建新寺赐名。公元954年,五代吴越国王钱弘俶为高僧永明禅师敕建新寺,赐名永明禅院。二是寺院因重建、朝代更替而请求帝王赐额改名,或在原名前后敕加新名,称作“请额”。例如五代吴越国敕建的永明禅院,宋太宗赐额“寿宁禅院”,1128年宋高宗赐额“净慈禅寺”,1149年宋高宗又改额“净慈报恩光孝禅寺”,清朝康熙皇帝改名为“净慈禅寺”。三是帝王临幸赐名。康熙皇帝驾临杭州,将灵隐寺赐名“云林禅寺”。

3. 出资建造寺院的官员、居士或信徒命名。一类是达官贵人舍宅为寺或是建造坟寺,自然拥有对寺院命名的资格。东晋太元二年(377年),会稽郡守王荟为迎接高僧竺道壹居住而舍宅创建寺院,命名为嘉祥寺。另一类是帝王家眷后妃为祈福而设的家庙、香火院。杭州宝成寺为后晋天福年间吴越王妃仰氏建的香火院,初名“释迦寺”。

4. 民间长期使用约定俗成的俗名。寺院本名因某种原因不为民间接受,信众用更为直接通俗的方式称呼寺院,久而久之,

基金项目: 本文系浙江省旅游局课题《杭州香客旅游的成因和对策研究》(项目编号 2007ZJLK—C—20)阶段性课题。
作者简介: 石洪斌(1968—),男,安徽蚌埠人,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旅游学院副教授,国家高级导游,主要研究方向为旅游文化、旅游规划、导游实务研究。

俗名流行开来，以至本名不常用，甚至被社会所遗忘。比如杭州大慈定慧禅寺因寺院里有“天下第三泉”虎跑泉，俗名虎跑寺更是名闻遐迩。

二、寺额命名的缘起

1. 以佛经句义和佛法禅理来命名。这是佛教寺院最普遍的命名方式，如杭州净慈寺。佛经认为“净极觉圆、成无上道”不出一“净”义，“广度有情、悲臻永劫”不出一“慈”义。此类寺额最常用的字，有普、法、相、惠、妙、觉、定、宝、净、明、慈、智、慧等。

2. 以祈福帝王保佑国运等吉祥之词来命名。此类寺额多为皇帝或国王赐名，多用圣、天、报、保、恩、福、国、庆、寿、兴、安、宁、祥等字，也是寺院比较多的命名方式。1114 年，宋徽宗为祈求永保宋室江山，将杭州中天竺改名为“天宁万寿永祚禅寺”。1139 年，宋高宗为表示奉祀宋徽宗，将净慈禅寺改名为“报恩光孝禅寺”。

3. 以寺院所在山川地理名称或周边优美环境景观来命名。余杭径山寺因位于径山故名，奉化雪窦寺因位于雪窦山得名。康熙皇帝南巡杭州灵隐寺，登北高峰揽胜，见山下云林漠漠，整座寺宇笼罩在晨雾之中，于是赐灵隐寺名为“云林禅寺”。

4. 以皇帝或国王年号来命名。唐玄宗在开元二十六年(738 年)六月一日颁诏敕命：“每州各以郭下定形胜观寺，改以‘开元’为额。”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下诏将全国各地稍具规模之寺院敕改为“太平兴国寺”。因此，全国各地多有开元寺、太平兴国寺额。

5. 以寺院传说典故或开山祖师语言来命名。绍兴戒珠寺本是王羲之故宅，相传王羲之失落一颗非常喜爱的明珠，怀疑是老僧所窃。老僧得知后郁闷不乐，含愤而死。后来王羲之发现明珠为家中的白鹅误吞，追悔莫及，舍宅为寺以纪念老僧，命名“戒珠寺”，表明戒绝玩珠之癖。杭州灵隐寺处于西湖飞来峰下，东晋咸和初年印度僧人慧理和尚云游至此，见此峰而叹曰：“此乃中天竺国灵鹫山一小岭，不知何代飞来？佛在世日，多为仙灵所隐。”遂于峰前建寺，名曰灵隐。

6. 以寺院的镇寺之宝如佛塔、佛像等来命名。新昌大佛寺，源于寺内有南朝齐梁年间依山崖开凿 30 年而成的“江南第一大佛”弥勒佛像命名。湖州铁佛寺原名开元寺，因宋僧鉴真铸铁观音像置于东廊，号铁观音院，明朝改名为铁佛禅寺。

7. 以佛、菩萨名号或特殊的人名来命名。海盐金粟寺由西域僧人康僧会创建于吴赤乌年间，传为江南最早的佛寺。“金粟”指东方无垢世界的金粟如来维摩诘居士。临安天目山昭明禅寺是因南朝梁文学家昭明太子萧统曾在此分《金刚经》，编选《昭明文选》得名；宁波阿育王寺是以印度孔雀王朝国王阿育王命名的千年古刹。

8. 以上面两种以上缘起进行组合来命名。如杭州虎跑寺位于大慈山，本名大慈定慧禅寺，是地理名称和佛法禅理的组合。杭州净慈寺位于南屏山慧日峰下，是吴越国王为高僧永明禅师创建，赐名慧日永明禅院，是地理名称和特殊人名的组合。

三、寺额命名的特点

基于清李卫监修《西湖志》、冷晓著《杭州佛教史》、李芳民著《唐五代佛寺辑考》和浙江寺院名录(<http://hua-ib.com/siyuan/zhejiang/>)，按照寺额命名缘起对浙江古代佛教寺额进行分类，从中探讨佛教在中国两千年发展兴衰的特点。

1. “祈福吉祥”“帝王年号”类寺额，反映了中国古代佛教繁荣与政权的正相关关系。此类寺院主要集中在东晋南朝、唐五代宋朝、明朝三个阶段，与中国古代佛教繁荣时期是完全吻合的。“祈福吉祥”“帝王年号”类寺额数量，与佛教三个繁荣阶

段的关联度最为明显，充分证明中国历史上政权对佛教的态度，直接决定了佛教发展的基本态势。

东晋僧人与统治者关系密切，竭力将佛教与世俗统治者相协调，如道安所感叹：“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东晋佛教在帝王与士大夫的扶持下得到空前发展，南朝时期佛教进一步受到统治者重视，几乎成为国教，佛教在中国迎来了第一个发展高潮。东晋时期“祈福吉祥”寺额如崇善寺、嘉祥寺，目标针对的下层民众，反映佛教主动贴近世俗的祈愿。南朝时期“祈福吉祥”寺额如保安寺、吉祥寺、永宁寺，则明显体现了统治者的意志，表明统治者开始重视佛教的社会作用。正如南朝宋文帝所言：“若使率土之滨，皆纯此化，则吾坐致太平，夫复何事！”（《弘明集》卷11之《何尚之答宋帝赞扬佛者事》）

有唐一代除唐武宗外，诸位皇帝对佛教的态度基本上采取的是整顿、扶持和利用政策，以达到维护其政权统治的政治需要。佛教的社会性和功利性进一步发展，把佛教当成保佑国泰民安和求得世俗生活幸福的目的越来越明显，因此“祈福吉祥”类寺额数量在唐朝各类寺额中雄踞第一，占34.7%，就顺理成章了。“祈福吉祥”具体表现为：或为皇亲国戚荐福祈寿，如天宁寺、万年寺、护圣寺、报恩寺、延寿寺等；或为战死者超度亡灵，如报国寺、相国寺、招贤寺等；或忧五谷不登、祈雨酬德，如普曜寺、大明寺等。

五代时期，浙江境域所在的吴越国三代五王面对中原长期战乱频仍，后期大宋帝国虎视眈眈，只能把祈求长治久安的希望寄托在佛教上。“祈福吉祥”寺额的功利性更加明显，安、保、报、天、国、福、寿、恩等成为寺额最常用的字，并且出现“崇仁寺”“崇教寺”之类寺额。这体现了吴越国王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下，对佛教不仅是利用，还有虔诚的推崇。

宋朝三百多年，由于一直处于内忧外患之中，统治者对佛教继续采取利用与限制并用的政策，如宋高宗所言：“朕于释氏，但不使其大盛耳。”（《宋会要辑稿·释道一》）因此，两宋时期的“祈福吉祥”寺额达到最高值，占两宋寺额总数的42.4%。宋王朝统治者通过寺院赐额、住持赐号和发放度牒收费，作为充实财政的经常性手段。许多著名寺院被多次赐额，导致宋朝的寺额普遍都很长，最多达到10个字，如径山兴圣万寿禅寺、中竺天宁万寿永祚禅寺等。“祈福吉祥”寺额，也由东晋以来祈求国泰民安、清明兴盛的主题，转变成统治者为自己祈求福寿或向先帝报恩孝顺，期望先帝神灵护佑的自卑心态。统治者对佛教的利用，客观上促进了佛教的繁荣，也促使佛教进一步世俗化。宋代僧人放弃前代疏远政治和不合作态度，开始绝对臣服于君主的权威，将“菩提心”解释为“忠义心”，出现崇圣寺、资国院、资圣寺等寺额。这说明宋代僧人宣教重心已经由普度众生向忠君报国的转变，佛教很大程度上几乎成了帝王的家庙。

“帝王年号”寺额全部集中在唐五代两宋时期，又以唐朝和两宋为最，唐玄宗和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都曾下诏敕令天下诸州以年号更改寺额，比如唐玄宗（开元寺）、宋太祖（开宝寺）、宋太宗（太平兴国寺）、宋真宗（景德寺、大中祥符寺）、宋仁宗（嘉祐寺）、宋英宗（治平寺）、宋神宗（熙宁寺）、宋哲宗（元符寺）、宋徽宗（崇宁寺）、宋孝宗（淳熙寺）、宋宁宗（庆元寺）、宋理宗（宝庆寺）、宋皇帝昀（祥兴寺）。两宋共18代皇帝，钦赐年号作为寺额的皇帝就有12位，几乎贯穿朝代始终，体现了宋代皇帝对佛教的重视，以及佛教与政治的关系比较和谐融洽，这也是佛教在唐五代两宋时期达到鼎盛时期的一个重要原因。

2. “地理环境”“传说典故”“镇寺之宝”类寺额，反映了佛教在中国传播的策略。“地理环境”类寺额是比较常用的寺额，占统计总数的14.1%，名列第三位。以寺院所在山名、水名、地名或周边优美的环境景观来命名，简单直接，明白易记，是古代社会普遍缺失文化的广大农民最容易接受的方便之门。因此自三国开始，此种寺额命名方式就绵延不绝，为各朝代寺院所采用。特别是在汉晋佛教初传时期采用最多，说明佛教在中国初期传播时，为了迎合信众调适妥协和向中国本土文化自觉靠拢的正确策略。

“传说典故”类寺额总体数量不多，集聚程度却很高，主要分布在晋朝、唐朝和五代时期，占到本类寺额的67.6%。晋朝时期比例高，是佛教初传中国时的策略使然。佛教初传中国多为天竺、西域僧人，进入浙江传教的高僧有安息国的安世高、月氏人支谦、康居国的康僧会、天竺的那罗延、慧理、昙猷等。这些外来高僧为了能够立足东土，扩大影响，吸收信徒，同时与儒、道展开激烈论争，必须编造一些传说典故或攀附神通事迹，来抬高自己地位。如慧理宣称飞来峰“乃中天竺国灵鹫山之上小岭飞

来”，有“仙灵所隐”，并呼猿为证，遂建灵隐寺。

随着信众不断成熟，初期传法采用的神通传说就很难再令人相信，因此“传说典故”类寺额就越来越少。唐朝五代时期由于佛教进入繁盛阶段，佛教八宗形成，禅宗“一花开五叶”，新建寺院众多，为了在宗派利益竞争中获得更多的信众和香火，寺院又重新操起“传说典故”手段。但是，传说典故的主体发生了变化，不再是虚无缥缈的灵鹫山、天台山神和太白金星，而是具体坐实为寺院里的某人某物，如观音像、飞英塔、灵芝、涌泉等，因而对信众更具有可信度，可以大幅度提高寺院的知名度，从而带来更多的信众和香火，扩大本宗本派的影响。宋朝佛教走向世俗化，禅宗一枝独大，呵佛骂祖早已把佛祖拉下神坛，神通灵异事件自然走到了末路，此后各朝代用“传说典故”做寺额也就只是偶尔为之了。

“镇寺之宝”类寺额数量上最少，仅占统计总数的 1.1%，且仅分布在五代宋朝和明朝，其原因与“传说典故”类寺额一样，是为了宗派利益竞争的新手段。所谓“镇寺之宝”，不过是玉佛、铁佛或者石佛之类常态器物，完全摆脱了“传说典故”的阴影，只是在体量规模、材质形态上可能异于其他寺院罢了。应该说，“镇寺之宝”是“传说典故”传法策略的补充，也是对“传说典故”传法策略逐渐失灵的反动。它是中国佛教的自我调适和救赎，割去遥远的、不自信的“天竺尾巴”，努力使佛教融入中国传统文化，成为中国人生活和心态一部分的体现。

3. “佛法禅理”类寺额，反映佛教义学思想发展的轨迹。“佛法禅理”类寺额无论从数量上(占 41.5%)还是朝代分布上(10 个朝代)都是最多的。佛教作为宗教自然是无时无刻以宣传它的教义作为最高宗旨。从历代“佛法禅理”寺额中，可以发现中国古代佛教义学思想发展的轨迹。“佛法禅理”类寺额在东晋以前佛法初传时期，多与释迦牟尼说法地灵鹫山有关。这说明初期传法的高僧非常重视法脉来源，通过寺额标榜其佛法正统性，强调因果报应的灵验，对佛法禅理的宣讲也只能停留在诸如佛教圣地(灵鹫、灵山、灵峰、祇园)、佛经名称(法华、方广)、佛教目的(禅悦、真觉)、佛教标志(莲花)等最基础的初级知识阶段。“法华寺额”在晋朝开始出现，表明由西晋竺法护译 10 卷本和后秦鸠摩罗什译 7 卷本的《妙法莲华经》已经相当流行，并受到一些寺院高僧的高度重视，成为弘法的核心。南朝佛教尚辨析、重义理，“发心寺”“精进庵”“双林寺”的命名，正是南朝僧人研习、弘传大乘瑜伽和《涅槃经》在寺额上的反映。

佛教在唐朝走向前所未有的繁荣，形成八大宗派，因此唐朝以后反映各家教义教理的寺额纷纷登场，寺额成为标举各派教义、宣扬成佛法门的鲜明旗帜。比如宣扬法相宗教义的有宝相寺、明空院，宣扬净土宗教义的有兜率寺、无垢院，宣扬禅宗教义的有栖心寺、大慈定慧禅寺，宣扬密宗教义的有灌顶寺，宣扬华严宗教义的有华严寺、无碍寺，宣扬天台宗教义的有定业院、寂照寺。分析五代宋朝时期“佛法禅理”寺额会发现，含有“定、慧、惠、智、圆、觉”等表现禅宗教义的寺额占有很高比例，“莲、慈、净”等表现净土宗教义的寺额也占有较高比例。这表明五代宋朝时期禅宗已经成为佛教的主流，净土宗成为天下共宗，也比较兴盛，“禅净合一”成为宋朝以后中国佛教融合发展的大趋势。

4. “佛号人名”类寺额，反映佛教信仰重心的演变。“佛号人名”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佛菩萨类名号，一是寺院僧人或舍宅主人的名字。西域僧人康僧会创建江南最早的寺院“金粟寺”，是希望刚接触到佛教的中国民众学习金粟如来维摩诘居士，先做个合格的居士，辅翼佛陀教化，保持洁净，自得解脱。南朝出现“慈氏院”寺额，表明至迟在南朝已经开始流行弥勒净土信仰；体现西方佛国净土信仰的“弥陀寺、无量寿院”寺额在五代时期开始出现，表明弥陀净土思想在五代时期已经超越弥勒净土信仰，被广大信众接受，地位稳固确立，成为净土宗的主流。五代时期出现了“观音院”“观音看经院”，表明至迟在五代时期已经开始流行专门供奉观音菩萨的信仰了，也标志着佛教人本化、世俗化的开始。

四、结语

佛教寺额与佛教的传入是同时开始的，中国古代佛教寺额从整体上说也有了两千年的历史。对佛教寺额的研究，从微观方面揭示了佛教繁荣与政权的正相关关系以及佛教在中国传播的策略、佛教义学思想发展的轨迹、佛教信仰重心的演变。可以说，佛教寺额的历史，也同样是佛教不断自我调适，融入中国本土化的过程，是佛教在中国两千年发展兴衰的缩影和风向标。

参考文献:

- [1] 丁福保.《佛学大词典》“寺额之始”条, <http://fodian.goodweb.cn/fodict.asp>.
- [2] 李卫. 西湖志 [M]. 清雍正十三年刻本, 1985:791—1142.
- [3] 李芳民. 唐五代佛寺辑考 [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6:178—206.
- [4] 冷晓. 杭州佛教史(下卷) [M]. 香港:香港百通出版社, 2001.
- [5] 严耀中. 中国东南佛教史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 [6] 释慧皎. 高僧传 [OL]. 中华电子佛典协会, 2007, <http://www.cbeta.org>.
- [7] 石洪斌. 杭州都市旅游 [M]. 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2010:115—118.